

一次仰望,发现一道古文化地层

吴金鼎：龙山文化的发现者

□王绍忠

一代考古大师吴金鼎先生系潍坊景芝镇万戈庄人氏，出身农耕世家，祖辈贫寒。深明大义的外祖母见其聪颖好学，慷慨资助，让年幼的吴金鼎就读于安丘德育小学、潍县广文中学，毕业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就读。1928年，吴金鼎怀着“知识救国”的宏图大志，刻苦深造，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，师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，系统攻读“人类学”。

早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，他便利用休息时间，外出从事实地考察活动。1928年3月28日上午，他临时取消了去章丘县东平陵城的计划，决定到城北5里之遥的城子崖考察。上午9时，他刚到达，举目仰望，竟然有了神奇的重大发现。原来，河畔城垣横断面，有一条长达6米的截面，出现了成堆的灰土和诸多陶片，真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一道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地显现于眼前。

吴金鼎惊喜交加，10天之后，他邀约董作宾进行了二次复查，初步认定此处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。1929年7月到10月，吴金鼎先后四次来到这里，对龙山周边十华里范围的古迹进行了详尽全面的考察，在小火烧过的红土层遗址中，发现贝壳、兽

骨，并寻觅到两枚骨针和五方石器，证明一片古代史迹便深藏于这片黄土层下。吴金鼎先生不经意间发现了埋藏在地下4000年之久的城子崖遗址，这真是“千载沉睡无人知，一朝醒来惊天下”！

吴金鼎将这一重大发现汇报给“中国考古学奠基人”李济先生，先生对此感到十分兴奋和震惊。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轰动了整个史学界，引起了全国教授、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。1930年11月初，中央研究院及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了“山东古迹研究会”，双方各派四名代表。11月4日，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的成立大会上，研究确立了遗址的发掘计划。研究院方由李济、吴金鼎、董作宾、郭宝钧参加，这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史前发掘的整个考古过程。

1931年，在李济、梁思永主持下，对城子崖遗址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挖掘工作，挖掘面积达1900平方米，发现上层为春秋时期的地层，下层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地层。沟内惊现了山丘似的陶片、石器等物品。自此，这里被考古界誉为“龙山文化发祥地”，俗称“黑陶文化”。

陶片经复原后鉴定，陶面光滑细腻，证明此时陶器的制作已由“慢轮”整修发展为“快轮”修复。器皿有生产型和生型两种。生产型有



吴金鼎

石斧、石锛、石犁等；生活类有盂、杯、盆、碗、盘、罐、瓮、鬲、鼎等，发现最多的为民间生活制品。凝视每件陶器，可以触摸到世俗风情的脉搏。虽然大都略显粗糙，装饰图案也多为植物叶子、花朵、菱形、三角形等，但它们是対自然界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加工，足以彰显出向文明社会进展的步履。特别令人惊异的是由陶片复原的“三角鬻”，薄如壳、黑如炭、亮如镜、硬如瓷，掂之飘忽若无、敲击声响似磬，具有玉石一般的沉静优雅之美，极具观赏价值。

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，吴金鼎撰写了龙山文化研究最早的一篇论文《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》，对龙山

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讨论，同时对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黑陶做了十分生动、逼真的描述：“黑陶之质料极为细腻，内部亦极为均匀。表面有时显平行之细纹，器之底部亦有逆表针向之旋纹，是当时已有陶轮。”

全国学者将城子崖考古誉为“中国考古第一案”。龙山文化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—2000年之间。这一结论已写入中学历史课本之中。而当年吴金鼎先生在龙山的重大发现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。1948年9月18日，吴先生因患胃癌，久治无效病逝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卷》中，将他誉为“最有成绩的现代考古学家”。

时隔一甲子之后，人们没有忘记吴金鼎先生的重大贡献和无尽遗愿，1990年春，在山东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带领下，又二次拉开了城子崖东部发掘的大幕。二次发掘又出现了大量生活实用陶器，令人惊喜的是，还发现了城子崖黑陶的高端代表作——陶甗。它高脖颈、长尖流，两条前腿并列，有一条肥大的后腿；宽扁的半环状抓手，活脱脱一只昂首挺立的大鸟。这表明先祖的陶塑已突破写实的禁锢，进入自由想象制作的阶段。

崂山风景秀，行路实在难，这是旧时到崂山的真实写照。德占时期去崂山只有台流路，南线在八水河一带被悬崖和大海堵住，上崂山只好爬天梯。上世纪30年代沈鸿烈亲自规划，修建了多条崂山旅游公路。其中以太清宫至刁龙嘴最为有名，这条路全长17.5公里，将崂东一带沿海名胜连接起来，到北九水的路也畅通无阻，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游览崂山，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是一例。

他曾写道：“要讲伟大，要耐人寻味，自然是外崂沿海一带，从白云洞、华严寺到太清宫的路。”1934年7月13日，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、儿子郁飞所乘坐的海船午后一时到达青岛。当晚，郁达夫一

【名人印记】

郁达夫曾游崂山

□宋立嘉

家借宿在汪静之(当时在青岛市立中学任教)的同事卢叔桓家。第二天，郁达夫一家移居至友人早已为其租好的位于广西路38号的骆氏楼上，此后一个月时间内，郁达夫一家皆居于此。房东骆氏本为杭州人，在青岛已住了近十年，与郁达夫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到青岛后，郁达夫就盼望着游崂山，他读了《崂山志》，买了《全植物图鉴》等方面的书，先在文字上了解崂山，看了报纸，报纸所载的广告称：“到崂山去避暑，比牯牛山岭凉爽，比莫干山伟大，比北戴河美丽，比青岛市节省，崂山大饭店最相宜。”这很对他的胃口，引起他的极大兴趣。

8月1日早晨，郁达夫即由寓所出发，乘坐的是青岛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公交汽车。下车后，步行上山。板房桥之上尽是悬崖峭壁，公路曲折折，沿途林深树茂，茅草灌木丛生，路就修在峭岩的山腰间，盘曲往复，极尽转折之至，俗称“十八盘”。到柳树台，所买车票有“崂山饭店可以午餐”字样，就走进崂山大饭店吃了午饭。这崂山大饭店旧址是德国人1904年建成的麦克伦堡疗养院，饭店经营各种精美的风味西餐，其中以一磅重的精粉面包和海味拼盘著称。遗憾的是在饭店由于接待不周，“值事者董某，貌尤奸恶”，给郁达夫留下坏印象。

午饭后，郁达夫由柳树台东北面下山，经观奇石屋，沿溪而至北九水庙(现在的太和观)。在当天的日记中，郁达夫记载，当时由九水庙至靛缸湾中途由饭店北面上山，五里可至蔚竹庵。庵有老道，名李祥资，高密人，住此处三十余年矣，山路开辟，皆由一人经营。山腹亦有小村落，仅茅屋数间耳。附近一带，统名双石屋村。自内九水的双石屋村外，向东北行，翻过山头，即达蔚竹庵。蔚竹庵上，山比庵高数倍，大石岌岌欲坠，老松盘绕其间，婆娑飞舞，由院中仰望，前临鹇涧，涧溪流水、鸣笛如曲，被人们誉为崂山十二景的“蔚竹鸣泉”。

在游览北九水的过程中，郁达夫还认真考察了很多石刻。“九水与九水庙之间，王子洞旁，有连捷桥题名碑，碑色很古。北九水庙前之保合桥，系光绪二十年、三十年修建，桥旁有勒石碑记。我们所见之碑文，以柳树台西南下竹窝村中段氏妇之节烈碑为最古，系同治四年所立。当时该村中也似以段姓为大族，因道旁墓碑，姓段氏者独多也。”郁达夫被北九水的风光所陶醉，激情如潮，文思涌心头，在第三天后，精心创作了歌颂崂山的诗：柳树石屋接澄潭，云雾深藏蔚竹庵。十里清溪千尺瀑，果然风景似江南。

这首诗后来由郁达夫的侄女婿著名书法家黄苗子1981书写，幅高4米，刻在内九水的二水路边双石屋村中的巨石上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我在嘉祥二中读书的日子

□曹务堂

■艰苦的办学条件

嘉祥二中坐落在一户地主家的院落内，后面盖了两排青砖瓦房，那就是我们的教室。室内没有天花板，大梁就悬在头顶上。记得有一天上课时，一个小壁虎落到一位女同学的脖子里，吓得她大叫起来。

我们教室后面是操场，当时学校没有围墙，而是在周围种了许多带刺的洋槐树当围墙。学校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洼地，方圆五六十里不见村庄。夏天是茫无涯际的绿色海洋，雨季到来，则是一片汪洋泽国。直到1960年我高中毕业，大梁上都盖有电灯。每个教室在大梁上挂一盏汽灯，发出呼呼阵风似的声音，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。汽灯很怪，过不了半小时就会自动变暗，这时就必须重新打教，使它再慢慢变亮。夏天时，因教室通风好，学生尚可忍受，可一到冬天就惨了。记得冬天上课时，实在冻得受不了了，老师就叫我们跺跺脚。下课后，我们就靠着墙根或在院子里两三人或四五人互相挤碰以取暖。当时我们把这种活动称之为“挤油”。

我们那一届是初中七级，共招生217人。根据当时的师资力量，分为四个班。记得开学后的一天下午，领导要新生到操场上集合，按身材高矮站队。然后要学生按“一二三四”的口令报数。结束之后，领导宣布，报“一”的为一班，报“二”的为二班，以

1955年我小学毕业，考取了离家仅一箭之遥的嘉祥二中。二中虽然地处农村，但却是嘉祥县建校最早的一所中学。校长刘伯羽是位“老革命”，配有勤务员，是当时我们县教育系统最大的官。据说当时教育系统开会，大家都希望我们校长参加，只要他参加，参会人员的伙食费就可以每人每天增加两毛钱，就能吃到肉了。1958年我考取了母校的首届高中，当时实行文理分科，我考的是文科，学制两年。1960年我从母校高中毕业。

此类推。因为我报的是“二”，所以就分在了二班。

■“难解”的物理题

虽然50多年过去了，但我对一道物理考试题至今难忘，原因是，全年级217人，只有一人答对了这道题。题目是：“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，假如你跳一下，你会落在原地，还是会落在原地的后面？”我们都没有见过火车，更不用说坐火车了。于是我们只好凭想象认为，那肯定是落在原地的后面了，因为在你腾空的那一刹那，火车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。结果，试卷发下来之后，同学们都傻了眼，全都是错号，只有一位老师的女儿答对了，因为她坐过火车。教我们物理的是一位姓蒋的老师。我说：“蒋老师，怎么可能落在原地呢？”蒋老师微笑着回答：“你想想看，地球转得快不快？”我说“快”。他接着说：“那你现在跳一下，看看落在什么地方。”当时我依然不解，心想：老师，你怎么能拿火车跟

地球比呢？

由于学校地处农村，帮助农民劳动是很自然的事。记得上初一时我们曾帮助农民打过蚂蚱。学校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，夏初经常有蚂蚱肆虐，于是全校出动，每人手拿一个旧鞋帮和木棍绑在一起的“拍子”，师生千余人，队伍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。到地点后，分班一字排开，我们一边打一边把蚂蚱赶到地头预先挖好的沟里，然后用土埋上。

■无奈的“除四害”

我上初中时，“除四害”（即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麻雀）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，那时人人一个苍蝇拍，不上课或课间操时，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到厕所去打苍蝇。把苍蝇打死之后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小瓶里，然后一个地数给卫生委员，由他记录下每个人的“成绩”，每天公布。据我记忆，数完苍蝇后，没看见谁洗过手，当时学校只有一口井，而且离教室

很远。

打麻雀必须在晚上。所以，一到晚上，我们就扛着梯子到农户家的屋檐下去“摸”麻雀。逮着麻雀之后，将它的两条腿剪下来，然后交给卫生委员，两条腿算一只麻雀（注：后来一位生物学家向毛泽东建言，说麻雀是益鸟，吃害虫，功大于过。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言，“解放了”麻雀，替换成臭虫）。

捉老鼠更是困难，必须在家里床底下放老鼠夹子。每次放学回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老鼠夹子逮着老鼠了没有。如果有，那真是如获至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立刻把它的尾巴剪下来装进口袋里，然后带到学校交给卫生委员。

后来，为了响应“大炼钢铁”的号召，我们学校也建了一座高约十米的“炼铁炉”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时需要石灰，而我们那里又没有这玩意儿，只好到50里外的县城去拉。记得当时我们班借了一辆马车，由班长驾辕，十几个男生用绳子在两旁拉。我们是下午出发的，到了县城已是掌灯时分，安排在县一中住宿。有一位同学跑到城里去观景。回来后他异常高兴，我们问他看见什么了，他说他看见汽车了。要知道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汽车啊！

我在嘉祥二中学习了五年，给我留下的回忆有酸也有甜。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，但有些往事至今难忘，令我回味无穷。